

史料

NO.114

文史精華

第一个五年计划与156项工程
百年回眸曹聚仁
张闻天之子的坎坷人生
史迪威与蒋介石
中国登山队首登珠峰的遗憾
香港廉正公署反贪反腐纪实



ISSN 1005-4154

11>



9 771005 415007

1999 · 11

月刊 ● 每月6日出版

● 编辑出版/文史精华编辑部 ● 地址/石家庄市维明北大街58号 ● 电话/8603866 ● 邮政编码/050051

EA34/42

WENSHI JINGHUA

文史精华

华北地区十佳期刊

主 编/徐俊元

副 主 编/石玉新

杨小波

法律顾问/金佩莹

版式设计/毛 地

主办单位/河北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 辑/《文史精华》编辑部

社 址/石家庄市维明北大街 58 号

电 话/(0311)8603866

邮政编码/050051

国际刊号/ISSN1005-4154

国内刊号/CN13-1166/K

订 阅/各地邮局(所)

邮发代号/18-212

国内总发行/石家庄市报刊发行局

国外总发行/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北京 399 信箱)

国外发行代号/M6147

广告许可证/冀工商广字省直第 048 号

排 版/石家庄方正计算机公司

6058729

印 刷/石家庄市红旗印刷厂

定 价/3.40 元

建国史话

第一个五年计划与 156 项建设工程/刘庆旻

4



人物春秋

百年回眸曹聚仁

附:罗青长谈曹聚仁/柳 哲

9

张国焘的胞弟张国庶/陈 菲

18

张闻天之子的坎坷人生/卢海鸣

19

佛学家陈健民先生/陈浩望

22

追忆“梅花将军”蒋纬国/蒋义海

25

政坛纵横

史迪威与蒋介石/毛珣省

28

总 114 期 ■ 1999 · 11

- 集近代现代史料之精华
- 存真求实史林独树一帜
- 述亲历亲见亲闻之故实
- 生动感人社会百态纷呈



史海存真 ●

- 南京总统府纪事(二)/苏 文 32
- 外国记者眼中的延安/卓爱平 42
- 中国登山队首登珠峰的遗憾/国 红 三 足 46

经济史综 ●

- 中国近代纺织工业先驱童润夫/童然星 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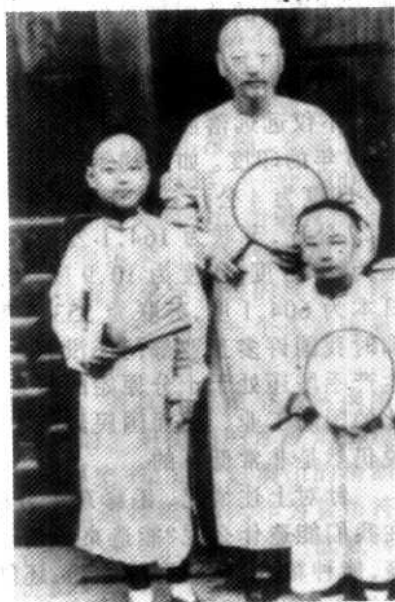
港澳之窗 ●

- 香港廉政公署反贪反腐纪实(一)/庄 满 52
- 澳门走笔二则 59

一去不返的铜马雕像

澳门最古老的建筑妈祖阁/傅宁军

- 封面/“一五”期间,苏联专家和鞍钢设计处的技术人员在研究工程设计
- 封二、封三/人民政协 50 年
- 封底/曹聚人 1959 年与夫人王春翠合影



敬请各报刊转载本刊文章时通知本编辑部。欢迎读者提供转载本刊文章的报刊原件或复印件,必有酬谢。
如有漏页、错页、残损等,请寄回本刊编辑部调换,本刊负责退还读者所付邮资。

●本期导读●本期导读●本期导读●本期导读●本期导读

文史精华

一九九九·十一

总第一一四期

●新中国建立之后，经过三年恢复的国民经济仍然十分薄弱和落后。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党中央提出了以工业为主体，以三大改造为两翼的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并决定制订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从此我国国民经济开始步入正轨。《第一个五年计划与 156 项建设工程》介绍了第一个五年计划产生的经过及苏联援建我国 156 项建设工程的情况。

●曹聚仁的一生极富传奇色彩，有时声誉鹊起，有时沉寂无闻，曾身经枪林弹雨，也曾左右挨骂，他还曾成为中南海毛泽东、周恩来的座上宾。《百年回眸曹聚仁》回顾了他的传奇一生。

●本刊 1998 年第十二期曾发过一篇《何应钦与史迪威》的文章，讲述了在抗战期间史迪威与何应钦的交往过程。本期刊发《史迪威与蒋介石》一文介绍的是中国战区盟军统帅部最高统帅蒋介石与中国战区统帅部参谋长史迪威之间的龃龉和矛盾以及史迪威最后被美国总统召回国的经过。

●中国登山队曾在 1960 年 5 月 25 日凌晨从北坡攀上珠穆朗玛峰。然而这一奇迹，在世界登山史上却成了一桩有争议的悬案。主要原因是登山队没有留下登上顶峰的影片证据。《中国登山队首登珠峰的遗憾》讲述了这次登山的过程及没能留下影片的原因。

EA34/42

WENSHI JINGHUA

文史精华

华北地区十佳期刊

主 编/徐俊元

副 主 编/石玉新

杨小波

法律顾问/金佩莹

版式设计/毛 地

主办单位/河北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 辑/《文史精华》编辑部

社 址/石家庄市维明北大街 58 号

电 话/(0311)8603866

邮政编码/050051

国际刊号/ISSN1005-4154

国内刊号/CN13-1166/K

订 阅/各地邮局(所)

邮发代号/18-212

国内总发行/石家庄市报刊发行局

国外总发行/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北京 399 信箱)

国外发行代号/M6147

广告许可证/冀工商广字省直第 048 号

排 版/石家庄方正计算机公司

6058729

印 刷/石家庄市红旗印刷厂

定 价/3.40 元

建国史话

第一个五年计划与 156 项建设工程/刘庆旻

4



人物春秋

百年回眸曹聚仁

附:罗青长谈曹聚仁/柳 哲

9

张国焘的胞弟张国庶/陈 菲

18

张闻天之子的坎坷人生/卢海鸣

19

佛学家陈健民先生/陈浩望

22

追忆“梅花将军”蒋纬国/蒋义海

25

政坛纵横

史迪威与蒋介石/毛珏省

28

总 114 期 ■ 1999 · 11

- 集近代现代史料之精华
- 存真求实史林独树一帜
- 述亲历亲见亲闻之故实
- 生动感人社会百态纷呈



史海存真 ●

- 南京总统府纪事(二)/苏 文 32
- 外国记者眼中的延安/卓爱平 42
- 中国登山队首登珠峰的遗憾/国 红 三 足 46

经济史综 ●

- 中国近代纺织工业先驱童润夫/童然星 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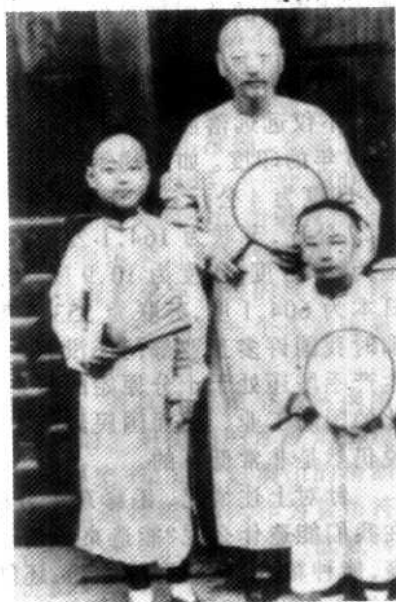
港澳之窗 ●

- 香港廉政公署反贪反腐纪实(一)/庄 满 52
- 澳门走笔二则 59

一去不返的铜马雕像

澳门最古老的建筑妈祖阁/傅宁军

- 封面/“一五”期间,苏联专家和鞍钢设计处的技术人员在研究工程设计
- 封二、封三/人民政协 50 年
- 封底/曹聚人 1959 年与夫人王春翠合影



敬请各报刊转载本刊文章时通知本编辑部。欢迎读者提供转载本刊文章的报刊原件或复印件,必有酬谢。
如有漏页、错页、残损等,请寄回本刊编辑部调换,本刊负责退还读者所付邮资。



第一个五年计划与 156项建设工程

●刘庆旻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中国发展经济、实现民族富强开辟了广阔的道路。毛泽东曾经预言:中国经济建设的速度将不是很慢而可能是相当快,中国的兴盛是可以即日成功的。

为什么要编制“一五”计划

新中国建立之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从来就有的能够战胜一切困难的英雄气概,带领全国人民开始了经济建设的新长征。但也必须看到,新中国在解放之前的经济发展水平是极为低下的。因而,三年恢复时期刚结束时的我国国民经济,仍然显得十分薄弱和落后。

1952年,我国许多重要的工业产品人均产量,不仅远远落后于工业发达国家,也落后于1950年的印度。如人均钢产量,中国为2.37公斤,印度为4公斤,美国为538.3公斤,日本为81.7公斤,苏联为164.1公斤;人均发电量,中国为2.76度,印度为10.9度,美国为2949度,日本为604.1度,苏联为553.5度。这是因为,那时我国许多工业部门还没有建立起来,农业生产手段还处于十分原始的状态,还没有现代化的国防工业,因而国民经济整体水平总的来说仍然是非常低下的。

针对上述情况,毛泽东十分感慨地说:“现在我们能造什么呢?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为此,毛泽东语重心长地告诫大家:牛皮不要吹得太大,尾巴不要翘起来。中国人还得谦虚谨慎,发愤图强,继续奋斗。

为了进一步加速国家的经济建设,就在国

民经济恢复阶段即将结束的时候,党中央根据毛泽东的建议,提出了以工业化为主体、以三大改造为两翼的过渡时期的总路线。随即,根据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要求,党中央决定制定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

那么,“一五”计划是怎样编制的呢?

1951年2月,中央在北京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主要讨论了8个问题,其中最主要的是提出了“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重要战略思想。会议明确指出,这个思想“要使省市级以上干部都明白,准备时间,从现在起,还有22个月,必须从各方面加紧进行工作”。在这次会议精神指导下,中央财经委员会于当年春天提出了五年初步设想,这个设想后来成为编制“一五”计划的最初尝试。第二年初,根据周恩来的提议,中央决定成立由周恩来、陈云、薄一波、李富春、聂荣臻、宋劭文组成的领导小组,组织领导“一五”计划的编制工作。同年8月,仍由中财委具体负责,试编出《五年计划轮廓草案》。这一草案,虽然只是粗线条地勾勒了计划轮廓,提出的计划指标还略显过高,但它为以后修订计划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蓝本。

当时,中国共产党人对于如何发展经济建设心里是没有底的,而最早实行计划经济并且取得显著成绩的是当时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中国那时实行的是“一边倒”的外交政策,这就决定了只能向苏联学习经济建设经验,并希望能够得到苏联的帮助。在这样一种大的环境下,《草案》编出后,中国马上派出以周恩来为团长的政府代表团携带《草案》赶赴苏联征询他们对计划的意见。苏联政府领导人看过《草案》后认为,这还不能算是五年计划,不仅不是计划,



▲1952年8月,中央财经委员会编写出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轮廓草案。8月17日,周恩来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赴苏联,与苏联领导人商谈关于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有关问题。图为代表团到达莫斯科。

即使作为指令也不够。他们表示愿意对我们的《草案》加以进一步研究,并提出修改意见。

这次赴苏,周恩来、陈云在苏联逗留了一个多月,其间,两次拜会了斯大林并专就“一五”计划问题向斯大林进行了请教。斯大林听了中国同志的请求后诚恳地对“一五”计划谈了一些原则性的意见,他说,中国三年恢复时期的工作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但五年计划草案中规定工业总产值,每年递增20%,我认为太高了,应该降到15%或14%。他还说,计划不能打得太满,要留有后备力量,以应付意外困难和事变。周恩来等对斯大林提出的意见非常重视并认真加以分析和研究,后来这些意见在定型的计划中大都得到了采纳。

1952年底,中央领导层在讨论《五年计划轮廓草案》时,细致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并结合实际作出了四项指示:一是要执行“边打、边稳、边建”的方针;二是要把有限的资金用到国家重点建设中去;三是要合理利用现有工业基础,充分发挥现有企业的潜力;四是要以科学求实的态度从事计划工作,使计划能够反映出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中央的这些指示,在后来的计划编制工作中得到了很好地贯彻。翌年初,国家计委、中央各部、各大区又进一步广泛收集了有关经济发展状况的资料和数据,中财委根据这些资料和数据,对上年编制的计划草案又作了必要的充实和调整。6月,国家计委根据中央的要求,按照“计划指标应留有余地”的精神,又进一步下调了原计划中的工业年均增长速度等各

项指标,并在计划中强调在重点发展重工业的同时要加快发展农业和交通运输业等。这些重大修改对后来计划编制工作的最终完成应该说是起到了关键作用。

周恩来和陈云离开苏联回国后,李富春率领代表团继续留在莫斯科与苏联有关部门进行广泛接触,征求意见,并商谈苏联援助我国的具体项目。

几个月后,苏共中央、苏国家计委和苏有关专家终于从总体上对中国的“一五”计划拿出了意见,米高扬为此向李富春作了通报,苏联提出这些意见大体要点是:一是认为“一五”计划的工业化和发展重工业是正确的;二是从政治上、舆论上、人民情绪上考虑,计划不仅要保证完成,而且一定要超额完成;三是要注意培养自己的专家;四是要加强地质勘探等发展经济的基础工作;五是要注意农业、手工业和小工业的发展等。六是要巩固人民币,扩大购买力,发展商品流通;七是要提高工业总产值、劳动生产率以及技术人员的增长速度,以保证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保证国家的积累和保证技术水平的提高。这些意见虽然是根据苏联经验而谈的,但基本上也符合中国实际,由此成为修改“一五”计划的重要参考。

1954年4月,根据工作发展的需要,中央决定调整编制“一五”计划工作的领导班子,成立了由陈云为组长的8人小组,其成员有高岗、李富春、邓小平、邓子恢、习仲勋、贾拓夫、陈伯达。这一年的8月,在陈云和李富春的支持下,8人小组对“一五”计划草案的初稿进行审议,他们接连举行了17次会议,对草案逐章逐节地进行讨论和修改。10月份,毛泽东和刘少奇、周

恩来聚会广州，用了一个月的时间，也对修改后的“一五”计划草案进行了审议。11月，在陈云主持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与会者仔细讨论了“一五”计划的方针任务、发展速度、投资规模、工农业关系、建设重点和地区布局。随后，对“一五”计划草案又提出了许多修改意见和很好的建议。1955年3月，党的全国代表会议讨论通过了“一五”计划草案，并建议由国务院提请人大审议批准，颁布实施。7月，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议审议并正式通过了“一五”计划。至此，编制“一五”计划的工作圆满结束。



▲陈云在中国共产党代表会议上作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

156项建设工程是“一五”计划的中心

第一个五年计划是实现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关键步骤，是总路线“一化三改”内容的具体化。由此说来，“一五”计划的任务是：“集中主要力量进行以苏联帮助我国设计的156项建设单位为中心的、由限额以上的694个单位组成的工业建设，建立我国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发展部分集体所有制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并发展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建立对于农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基本上把资本主义工商业分别地纳入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

建立对于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

在“一五”计划实施的过程中，工业化建设是其中心，而重工业又是工业建设的重点，所以说工业体系的建成，是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国家独立、民族富强的当然要求和必要条件。近代中国百年来之所以积贫积弱，原因之一就在于工业落后。新生的人民共和国要从根本上改变经济文化贫穷落后的面貌，实现国家独立和富强，就必须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

那么，逐步实现工业化，要走一条什么样的道路呢，从哪里入手呢？毛泽东和党中央经过反复权衡和深入讨论，决定优先和重点发展重工业。因为重工业是社会主义最为根本的立足点，是擎起社会主义大厦的栋梁，是社会主义能够顶天立地、百折不挠的“钢筋铁骨”。正如列宁曾经说过的，社会主义唯一的物质基础就是大机器工业，没有高度发达的大工业，就根本谈不上社会主义。然而，在当时，有些人则看不到发展重工业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在他们眼里，只看到我们缺乏资金，只看到帝国主义在封锁我们，只看到我们缺乏发展重工业的基础。他们认为，中国经多年战乱，亟需休养生息，当务之急是尽快恢复经济，改善人民的生活，因此应当多搞一些轻工业。还有人提出，工商业者可以专搞轻工业，国家则专搞重工业，这样分工合作，可以既利民又利国，其实这也是没有把重工

▼1953年5月，经中苏两国政府商谈，苏联政府决定帮助中国新建与改建141个企业（包括1950年签订的50个项目）。1954年10月，中苏两国政府在北京举行会谈，又商定增援15个项目。图为中苏双方代表周恩来（右）、米高扬（左）在《联合公报》上签字。





◀苏联专家和鞍钢设计处的技术人员在研究工程设计。

业放到应有的位置。针对上述种种，毛泽东提出了善意的批评，还称他们的观点是“小仁政”的思想。在一次会议上，毛泽东语重心长地对大家说，所谓仁政有两种：一种是为人民的当前利益；一种是为人民的长远利益。前者是小仁政，后者是大仁政。我们的重点应当放在大仁政上。也就是我们施仁政的重点应当放在重工业上。如果照顾小仁政，妨碍大仁政，这是施仁政的偏向。毛泽东在这里意在告诫人们，发展重工业和发展轻工业、农业一样，都是为着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所计。但发展重工业，为的是国家的长治久安，为的是人民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在当时那样的历史条件下，优先发展重工业应该说是一种必然选择，是智举也是善举。

实事求是地说，建国之初我们对于怎样发展重工业，上哪些项目，部门间保持什么样的比例，如何相互配合，确实不太清楚。在那样一种情况下，把苏联帮助我们援建的156项建设工程作为工业化建设、也是重工业建设的中心和重点，是当时历史条件下的必然选择。苏联的帮助，可以说是中国工业化建设得以进行的重要条件。156项建设项目是中苏双方经过多次商谈才确定下来的，有的是中方先提出的，有的是苏方先提出的，后经过协商确定。其双方协商大致有5次：第一次是1950年商定50项；第二次是1953年商定增加91项；第三次是1954年商定增加15项；第四次是1955年商定再增加16项；第五次是口头商定再增加2项。五次商谈共确定项目174项。后经过反复核查调整，有的项目取消，有的项目合并，有的一分为几，有的推迟，有的不列入限额以上项目，最后确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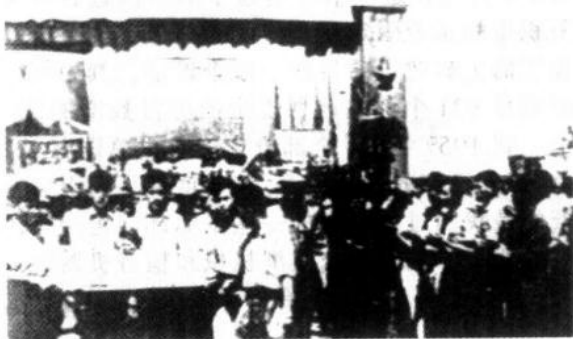
为154项。因为计划公布156项在先，所以仍称为156项工程。

156项工程主要是重工业项目，从实际施工的150项看：军工企业44个，其中航空工业12个、电子工业10个、兵器工业16个、航天工业2个、船舶工业4个；冶金工业企业20个，其中钢铁工业7个、有色金属工业13个；化学工业企业7个；机械加工企业24个；能源工业企业52个，其中煤炭工业和电力工业各25个、石油工业2个；轻工业和医药工业3个。这些建设项目主要配置在我国东北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其中的106个民用工业企业，布置在东北地区的有50个，中部地区的有32个；44个军工企业布置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共有35个，其中有21个安排在四川、陕西两省。不难看出，通过苏联援建的这150个项目的建设企业，以及为其配套项目的建设，使我国经济建设的工业布局迅速展开，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我国工业畸重沿海的不平衡状态。它对于我国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基础工业和国防工业体系的骨架，起到奠定社会主义工业化初步基础的重要作用。

当然，苏联在那时援助我们并不是无偿的。比如1953年5月中苏两国签订的协定中规定，在1954年至1959年间，中方向苏方提供钨

第一汽车制造厂 奠基纪念 毛泽东

▼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举行奠基典礼大会。





▲鞍钢三大工程竣工投产仪式上的苏联专家们

砂 16 万吨、铜 11 万吨、锑 3 万吨、橡胶 9 万吨等战略物资，作为苏联援建项目的补偿。但总的来说，苏联的援助是真诚的，他们动用人力、物力帮助我们编制计划、援建项目、供应设备、传授技术、代培人才、提供低息贷款，并派出 3000 多名专家和顾问来华帮助建设，确实表现出高度的国际主义精神。

“一五”期间建立 工业体系的成就

“一五”期间的经济建设，由于全党上下的共同努力，在加上苏联等社会主义友好国家的支持，以 156 个建设项目为中心的工业建设到 1957 年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其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改变了基本建设投资分配，一大批新建项目建成投产。

随着工业布局的展开，五年内完成基本建设投资总额达 477.22 亿元，超过原定计划的 11.6%，加上企业和地方自筹资金，全国实际完成基本建设投资总额 539.30 亿元。工业建设投资达 250.26 亿元，新增加的工业固定资产为 200.6 亿元，这一数字超过了旧中国近百年来所积累的工业固定资产（即 128 亿元）的总和。施工的工矿建设项目达一万个以上，其中大中型项目 921 个，比计划规定的项目数增加 227 个。到 1957 年底，全部投产的建设单位有 428 个，部分投产的有 109 个。其中值得人们引为自豪的是我国过去没有的一些工业部门包括飞机制造业、汽车制造业、重型机械和精密机器制造业、发电设备制造业、冶金和矿山设备制造业，

以及高级合金钢和有色金属冶炼业等从此建立起来，如：鞍山钢铁公司的大型轧钢厂、无缝钢管厂以及自动化炼钢炉；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沈阳第一机床厂；沈阳飞机制造厂；沈阳电缆厂；哈尔滨锅炉厂；哈尔滨量具刃具厂；哈尔滨电机厂；北京电子管厂；武汉重型机床厂；洛阳拖拉机厂；西安高压开关厂；西安电力电容器厂；兰州石油机械厂等等。由于这众多的

建设项目上马，使过去没有的许多新工业建立起来，这些新的工业部门的建立，填补了我国工业中的空白，使我国的工业结构大为改观。

第二，工业生产能力显著增强，工业发展速度明显增加。

由于新建企业一批批地投入生产，再加上原有企业生产潜力的发挥，使我国的工业生产有了调整发展。五年内，工业总产值以每年 18% 的速度增长，达到 704 亿元，超过了原定计划。现代工业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 1952 年的 26.6% 上升到 43.8%。重工业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 1952 年的 35.5% 上升到 45%，由此使旧中国重工业过分落后的状况有了很大改变。不仅如此，工业发展速度在当时也远远高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例如，1953 年到 1957 年工业生产平均每年增长速度，工业生产指数为：中国是 18%，英国是 4.1%，美国是 2.8%。钢的产量：美国是 3.9%，英国是 5.7%，中国是 31.7%。美国用 15 年、英国用 24 年使钢的产量增长 400 万吨左右，而中国却只用了 5 年时间。还有，在原煤产量、原油产量、发电量以及工业技术力量等方面也有了大幅度增长。

此外，在以 156 项建设项目为中心的“一五”建设期间，我国的农业生产、交通运输、邮电通信、商业、卫生和科学教育文化事业也都有了很大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也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各行各业轰轰烈烈，蓬蓬勃勃，整个国家欣欣向荣，蒸蒸日上，全社会呈现出崭新昂扬的精神风貌，这是建国以来少有的好年段。

责任编辑 谢凤英

百年弹指一挥间。我国现代著名作家、学者、记者和杰出的爱国文化人士曹聚仁(1900-1972),从1900年出生到现在,已经99年了。按照曹聚仁家乡浙江金华的风俗,今年是他的百岁冥寿,亲友应为他举行大祭。他的一生并不太长,与世纪同龄的他仅仅度过了3/4的世纪还差3年。

20世纪的中国文坛、报坛、学界,异彩纷呈,名家迭出,曹聚仁便是其中的佼佼者。曹聚仁的一生传奇色彩特浓,有时声誉鹊起,有时沉寂无闻,曾身经枪林弹雨,也曾左右挨骂,还曾经成为中南海毛泽东、周恩来的座上宾。他的这种既丰富多彩、又扑朔迷离的人生使他被人称为“谜样的人物”。曹聚仁的弟子、当代中国新闻史学界泰斗、中国人民大学著名教授方汉奇曾为业师曹聚仁作过如此的评价:

“曹聚仁在近代文坛和报坛上,是一个带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他的一生经历复杂,很不寻常,当过教授,当过记者,当过作家,当过各类报刊的自由撰稿人。……当教授,他是名教授;当记者,他是名记者;当编辑,他是名编辑;当作家,他是名作家。他博学多识笔耕不辍,……已出版的专著和文集,不下60余种,4000多万字,称得上是著作等身。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当中,像他这样高产的,除了梁启超、鲁迅、郭沫若和林语堂之外,似乎还不多见。成名的新闻记者当中,像他这样的饱学之士,也实在找不出几个。对曹聚仁的一生和他的一些作品和活动,历来众说纷纭,毁誉参半。……他是一个追求真理,勇于探索,心口如一的正直的爱国者;是一个‘决意收起自由主义的旗帜’,‘听从先觉者的领导’的,社会主义祖国伟大成就的热情鼓吹者;是一个为海峡两岸的统一,为开掘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为进步的文学和新闻事业作出过杰出贡献和作过许多有益的事情的人。他是不应该被忘却的。”

笔者认为方汉奇教授对曹聚仁的评价,十分中肯,也很有见地。周恩来总理曾在曹聚仁逝世后,盖棺论定地称他为“爱国人士”,并亲拟墓碑碑文:“爱国人士曹聚仁先生之墓”,安排有关人士将他的骨灰送回他的家乡浙江兰溪安葬,让他叶落归根。但

百年回眸曹聚仁

附:罗青长谈曹聚仁



▲曹聚仁晚年在香港书房中

● 柳 哲

周总理这一高度评价,却在其逝世后的27周年前夕,1999年7月5日下午4点至6点,原中共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兼总理办公室副主任、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在接受笔者采访时才首次披露出来。这值得欣慰,却又令人心酸,多少不白之冤,已在其生前乃至身后,默默承受了。

一 在澳门逝去的遗憾

1972年7月23日上午10时15分,曹聚仁在澳门镜湖医院停止了最后的呼吸。根据周恩来总理的安排,香港大公报社长费彝民为曹聚仁料理后事。曹聚仁病重期间,其夫人邓珂云经国家有关部门安排从上海到澳门照料;逝世后,周总理安排其子女曹雷、曹景行及时到澳门奔丧送别。曹聚仁逝世后的翌日,《澳门日报》、《大公报》、《文汇报》等港澳各大报都刊登了《知名作家教授记者曹聚仁在澳逝世》的消息。7月26日中午12时,由香港大公报社长费彝民主持了曹聚仁先生公祭出殡,翌日港澳各大报又同时刊登了消息,突出了“在解放以后,曹先生曾从事爱国工作,有所贡献”。曹聚仁的逝

世,不论是对他自己,还是对整个国家和民族,都是不可弥补的损失。

他在澳门撒手西归已 27 个春秋了,他的逝世留给他自己也留给后人的遗憾主要有哪些呢?笔者认为,曹聚仁先生晚年孜孜于海峡两岸的和平统一事业,未能亲见国共两党政要真正从中华民族利益出发,握手言和,实现祖国和平统一,这也许是最大的遗憾;其次,一直以史人自命的曹聚仁,多年准备欲写一部没有“政治偏见”的纯客观超党派之争的“可信”的现代中国史《现代中国通鉴》,拟分袁世凯王朝、北洋政府、国民党政权、抗战、国民党末运 5 编来写,结果只完成甲编出版,便赍志而歿;再次,曹聚仁先生在生命的最后历程中,着手写自传《我与我的世界》,计划写 100 万字,由于天不假年,只完成全书的一半不到的篇幅,便西归了,留下一部没有完成的自传。原本是本世纪“谜样人物”的曹聚仁,可以通过他自己的史笔,给后人揭示其神秘的面纱,但这已成为永远无法弥补的遗憾了。最后,曹聚仁孤身一人在香港 22 年从事写作和爱国工作,由于生活困迫,一直缺乏安定的环境让他从事文史研究。他多么渴望能回到大陆与家人团圆,回到自己魂牵梦绕的金华蒋畈,在父亲的墓前点上一柱清香,与父亲进行一次超时空的交谈,但这一切,都永远永远地不可能了。

二 从“神童”到教授

曹聚仁字挺岫,号听涛,常用笔名有陈思、阿挺、丁舟、赵天一、土老儿、沁园等。1900 年 7 月 7 日,出生在浙江浦江县长塘乡蒋畈村(今属兰溪市墩头镇)的一户农家,元代“儒林四杰”之一的理学家柳贯(1270—1342),明代“开国文臣之首”的文学家宋濂及清代大戏曲家李渔皆为他的同乡。他家原籍金华,明代中期迁到蒋畈。曹聚仁出生那天,正是曹家一排五间“务本堂”的大厅上梁的喜庆日,这孩子讨了个好口彩,母亲刘香梅就叫他“福厅”、“厅寿”。

曹聚仁的父亲曹梦岐是耕读出身的清末最后一科秀才,到杭州应举,结果落第,却接受了康梁维新思想,鄙弃功名,绝意仕进,立志以教育兴国,于是 1902 年捐家创办了一所在曹聚仁家乡最早实行男女合校、知行合一、兴办实业等等的乡村学校。他父亲称得上是中国乡村教育的先驱,培养了数千弟子,成名的就有曹聚仁、曹艺、王春翠、王琳、洪汛涛、叶庆文、蒋良顺、段萍等。曹聚仁是曹梦岐的次子,天生聪慧,幼承父训,先读私塾,后转到育才学堂学新学。3 岁就读了《大学》,而且字字会写,句句会讲;4 岁进了私塾,熟读《中庸》,能读能背能讲,在亲友面前,变成“神童”了;5 岁读完了《论语》、《孟子》;6 岁时就能动笔写出四五百字的短文;7 岁

那年能背诵《诗经》。他的兄嫂在校内的作文,多由他代笔,作文往往得第一,有人找他父亲写诉状而父亲外出时,他主动代父捉笔,也颇受父亲欣赏。他大姑妈 50 大寿时,曹聚仁就姑妈 20 余年来含辛茹苦抚养儿女成人的事实,挥洒了一篇 1200 字的贺文,当即被高挂在客厅里,客人们都赞不绝口,大姑妈也以有这样一位侄儿为荣。

曹聚仁 12 岁时就开始了他的教书生涯,在父亲创办的育才学校代课。1915 年他考入浙江第一师范学校,这里有单不庵、朱自清、俞平伯、陈望道、刘延陵、夏丏尊、刘大白等一批和新文化运动有密切关系的名师。曹聚仁在一师 5 年,为他以后的治学打下了基础。在五四运动席卷全国时,杭州一师也成立了学生自治会,他被推举为学生自治会主席,著名的“一师风潮”,便是由他和宣中华、冯雪峰等领导的。在这期间,由于经济拮据,他还将家乡《兰江日报》上的新闻改写后投寄给《之江日报》,往往被刊登出来,以补生活之需。这是他最初从事新闻工作的开始,此时他才 15 岁。后来他又主编《钱江评论》,与北京的《新潮》、上海的《觉悟》桴鼓相应,显示了他在文字、编辑、采访方面的特长。

1921 年他从浙江第一师范毕业后,投考南京高师和武昌高师皆失利,失望中来到了上海,经他的老师陈望道介绍而结识邵力子,先在上海浦东川沙县立小学教了半年书,次年春又由邵力子介绍到盐商吴怀琛家做家庭教师,在这里干了 3 年。在这 3 年中,他遍读了各种史书和诸子百家,反复钻研章太炎的国学著作《国故论衡》、《检论》,遍读了托尔斯泰、莫泊桑、巴尔扎克等人的世界文学名著,系统地读了多遍中国古典文学,并旁及史学、哲学等。一部剖析封建社会知识分子灵魂的《儒林外史》,他先后竟读了 100 多遍,可见他的读书之勤。

他一边读书,一边写稿,成为邵力子主编的《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的主要撰稿人,先后写了 100 多万字。依靠《民国日报》这个圈子,曹先生结识了许多师友,如柳亚子、叶楚傖、胡朴庵、陈独秀、张闻天、瞿秋白、戴季陶等。特别是吴稚晖,对他以后写



▲曹聚仁 1929 年与原配夫人王春翠在北京合影

文章影响很大。

1922年4月,国学大师章太炎应江苏省教育会之邀请,到上海作国学演讲,曹聚仁以《民国日报》特约记者身份前往听讲并作笔录。由于他的国学功底深厚,记录得很准确,深得邵力子称许,在《觉悟》副刊上连载,后结集《国学概论》一书出版,至今已先后印行了近40版,还有日译本,成为当时大专院校流行的文史课本。曹聚仁因此成为章太炎最年轻的弟子。

曹聚仁博览群书,学问渊博,加上他在上海文坛、报坛已崭露头角,1923年,他便开始走上了上海艺术专科学校、暨南等大学的讲坛,成为一名年轻的教授,先后在复旦大学、大夏、路矿学校、中国公学、持志大学等校任国文或史学教授。

三 《涛声》与《芒种》的时代

曹聚仁1931年8月22日在上海创办的《涛声周刊》,不仅得到过鲁迅生前的投稿支持,即使在60年以后,它的读者、曹聚仁同时代至今仍健在的文坛名家如章克标、钟敬文、柯灵、蔡尚思等仍有很深的印象,对其赞不绝口。笔者于前不久拜访过钟敬文这位将近百岁的老教授,他说当时在杭州读到《涛声》,便很喜读,很佩服曹聚仁敢于揭露社会黑暗的勇气。著名老作家柯灵为纪念曹聚仁题了辞:“曾闻涛声惊永夜,漫托鸦鸣作直言”,便是对曹聚仁创办的《涛声》的赞誉。

曹聚仁与鲁迅最初认识是在1927年12月21日,鲁迅应邀到上海暨南大学演讲,曹聚仁当时为暨南大学的教授,前往听讲并作了笔录,以《文艺与政治的歧途》为题,在《新闻报·学海》上发表,后收入《鲁迅全集》中。曹聚仁与鲁迅交往最密切的时期,还是他主编《涛声》、《芒种》及与人合编《太白》时期。1931年前后,国民党政府进行惨烈的文化围剿,实行文化高压政策,禁止进步书刊,封闭进步书店,通缉进步作家、有正义感的进步作家,纷纷创办杂志,呐喊救亡图存。《涛声》便是十分出色的一份杂志。曹聚仁当时在暨南教书,创办之初几乎是曹聚仁一人唱独脚戏,他的四弟曹艺和妻子王春翠也帮着打打边鼓,分担写稿和发行工作。曹礼吾、陈子展、黄芝冈、周木斋、杨霁云、陶行知等等也都为其写稿。1933年1月30日,鲁迅以“罗抚”的笔名写了文章《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寄《涛声》编辑的一封信》(载《涛声》第2卷第5期),主动投稿支持,后来曹聚仁受周作人之托帮助出版李大钊的文集《守常全集》,正式函请鲁迅先生为此写序,鲁迅慨然应允,不久写了《〈守常全集〉题记》,并用鲁迅之名发表在《涛声》(1933年8月19日第2卷第31期)上,

还有那首著名的律诗《悼丁君》也是用鲁迅名字在《涛声》增刊《曼陀罗》上发表的。鲁迅还为《涛声》创刊2周年写了专稿《祝〈涛声〉》表示祝贺,称赞说:“《涛声》上常有赤膊打仗,拼死拼活的文章。这脾气和我很相反,并不是幸存的原因……”,在文章的末尾,鲁迅曾忧心忡忡地说:“我是爱看《涛声》的,并且以为这样也还好,然而看近来,不变政治呀,仍谈政治呀,似乎更加不安分起来,则我的那些忠告,对于‘乌鸦为记’的刊物,恐怕也不见得有效……”。同年11月25日,《涛声》以“袒护左翼,诽谤中央”的罪名被迫停刊。

《涛声》是以“乌鸦主义”作为口号,以一只大乌鸦在波涛疾卷的海上展翅飞翔的图案作为商标的杂志。以乌鸦做标记,说明他们报忧不报喜,国难当头之际,报国家民族之忧,报国计民生之忧;对社会一切现象都采取批判的立场,反对蒋介石的文化高压政策,宣传抗日救国。

《涛声》自1931年8月22日创刊至1933年11月25日终刊号止,共出版了83期。这一杂志由于时间久远,又未重印,国内外研究者很难读到它,这对于了解和研究曹聚仁,实在是很大的遗憾。

1935年3月,曹聚仁又与徐懋庸共同主编了《芒种》半月刊,封面上印着一幅木刻《春牛图》,表示接近农民生活,也含着勤劳耕作待秋收之意。《芒种》与《太白》(曹聚仁是编委,陈望道主编),提倡大众语,是更接近口语的文体。据曹聚仁回忆,当时《芒种》所写的题材有三:“一是鲁迅所惯写的杂文,以批评现实剖解时事为主,我们在《涛声》时期所写的,都是这一类的文字。二是我们所写的历史小品,有着借古喻今的讽时意味。……三是报告文学,见之于报章的特写。此外,还有周建人、贾祖璋诸兄的科学小品。大体说来,我们所写的题材,都和现实生活有关的。”《芒种》批评现实,剖解时事,借古喻今,继承了《涛声》的批判精神和泼辣文风,成为左翼文坛中很有影响的刊物。笔者读过《芒种》、《涛声》的合订本,关于“批判胡适专号”及与林语堂论争始末的不少文章,是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及林语堂、胡适、曹聚仁极为宝贵的资料,但至今仍藏于秘阁,无人问津,鲜为人知。

曹聚仁在30年代初中期,除了主编《涛声》、《芒种》及与人合编《太白》外,还为黎烈文主编的《申报·自由谈》、谢六逸主编的《立报》副刊《言林》以及陈灵犀主持的《社会日报》等有进步倾向的报刊长期撰稿,反对国民党当局对文化事业采取的高压政策,提倡“大众语”运动,并站在国家民族的立场上,积极主张对日作战。1937年4月8日,他在纪念《社会日报》出版2000天的社论中声明:“我们不为政界作传声筒,不为作家写起居注,也不做任

何人的工具。为社会,为民众,把我们的刊物来宣达民众的意见,这是我们开宗明义所要宣示的第一要义。”在他为《社会日报》撰写的许多篇社论,被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新闻检查处的老爷们割手断脚地进行删改,有两次竟删得整篇“天开窗”。

他虽是文人,却始终是一个战士。

四 抗日救国,持笔从戎

1935年12月,上海各界代表集会组织抗日救国会,曹聚仁与沈钧儒、李公朴、史良、王造时、邹韬奋、章乃器等11人被推举为常务委员,成为救国会的重要领导人之一。他在会上慷慨陈词:“这回抗日,乃是我们这一辈人的事,要死,我们就去死好了。”抗日救亡是曹聚仁的心愿,他应国立音乐学院院长萧友梅之请写了一首战歌:“枪在我们的肩膀,血在我们的胸膛,我们来捍卫祖国,我们齐赴沙场!渡过鸭绿江,冲过大同江!哈,富士山算得什么!嘻,富士山算得什么!我们濯足乎扶桑!我们濯足乎扶桑!”他为宣传抗日救国,四处演讲,一次在无锡演讲,激怒了中统特务,将他抓起来关押,后经友人孙元良将军解救获释。

1937年7月7日抗战爆发,接着八一三淞沪抗战,曹聚仁脱下长衫,走下讲坛,走出书斋,以名教授、名作家、名学者的身份,投入到抗日洪流中去。他换上了军装,选择了战地记者这一危险的职业,勇敢地奔向抗战的第一线。他带笔从戎,住进了与苏州河一河之隔的八十八师孙元良司令部,随军进退,冒着枪林弹雨,出生入死,源源不断地为《大晚报》、《立报》和中央通讯社撰写战地通讯。10月3日,29架敌机轰炸闸北我军阵地,接着敌方通过媒介宣称:闸北中国军队阵地经轰炸后完全动摇,即将向后总溃退。曹聚仁闻讯写了一则600多字的电讯,报道了孙将军、旅团部军官及战壕中士兵的生活和抗战到底的决心。这一电讯发出后,各报以显著地位刊出,戳穿了日方散布的谣言,稳定和坚定了我国军民抗战的决心和士气。10月,他进入谢晋元五二四团驻守的“四行仓库”,目睹了800壮士英勇坚守的全过程,作了及时报道,给沮丧的中国人民以兴奋与安慰。后来,他将这些身临其境的一切写入了他编的《中国抗战画史》中,留下了极其重要的资料。

上海、南京相继失守后,他受中央通讯社聘请,任战地特派员,亲历了台儿庄战役和徐州会战。1938年4月7日,轰动海内外的台儿庄大捷,首先报道者就是曹聚仁。消息见报后,举国若狂。接着,曹聚仁的《台儿庄巡视记》长篇报道,于9日又在全国各报刊出。

上海失陷以后,曹聚仁随军南行,兼任《立报》及香港《星岛日报》的战地特派员,同时为邹韬

曹聚仁在抗日前线战地采访



奋的《抗战》三日刊撰写战地通讯,为《东南日报》写专栏。

曹聚仁是怀着抗日爱国热情参加中央社的。他不是国民党党员,中央社此时接纳他为战地记者,主要是为了拉拢他。他到达重庆时,蒋介石还试图劝他为蒋家王朝效劳,但曹聚仁并未落入彀中。抗战期间最使曹聚仁愤怒的,还是国民党假抗日真反共的阴谋。从自由主义观点出发,曹聚仁曾一度把国共之争当作“新旧教”之争。但在抗战问题上,他却倾向于共产党的主张和行动。在抗战初期的军事评论中,他就曾对八路军的平型关大捷和游击战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是“非其它军队所能做到”(《立报》“战场小语”)。抗战期间,他还访问过周恩来、陈毅、叶挺等领导人,积极向外界报道共产党的抗日战绩,首次向海外披露了“皖南事变”真相。抗战8年,曹聚仁除了战地采访外,还进行了180余次抗日讲演,每次演讲都座无虚席。

1939年他到了赣州,应蒋经国的邀请创办《正气日报》,任总编辑,并成了蒋经国的高参。这份报纸原先很不景气,经曹先生接手后,销路大涨,很快成为东南三大报之一,因此蒋经国特别看重他,以致于外间以为他是“太子系”,私下说他准备做“陈布雷第二”。1943年春,他因故拂袖离去。

1946年曹聚仁写了第一本蒋经国的传记《蒋经国论》，先在《前线日报》上连载，后由上海联合画报社出版，1953年11月香港创垦出版社再版。当年江南写《蒋经国传》时，就是受《蒋经国论》一书的启发而写的。五六十年代，曹聚仁为了祖国统一，与蒋经国还有一些交往，笔者近日发现了3期由蒋经国和曹聚仁主办的《前线周刊》，蒋经国是发行人，曹聚仁是主编，曹聚仁自己写有不少文章，蒋经国也写了《发扬青年正气》、《鲜红的血》、《寄给远在北国的朋友》、《生和死的统一》等都是有关血气的文章，这是研究曹聚仁和蒋经国的极为宝贵的资料。

抗战8年，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转折，使他成为一个名记者。如果说他以前是读万卷书的话，那么这8年就是行万里路了。抗战时他曾写过一首有名的感怀诗：

海水悠悠难化酒，书生有笔日如刀。

战场碧血成虹影，生命由来付笑嘲。

五 漂泊港澳，呐喊统一

解放前夕，《前线日报》社社长马树礼为曹聚仁全家已买好了去台湾的船票，最后他还是留在上海迎接解放，并没有去台湾。1950年7月，为了养活全家人，也为了他的自由主义思想在香港更能生存，他只身去了香港。行前，他曾写信给夏衍、邵力子等人，邵力子答复：在海外也一样可以为国家出力，他这一去结果羁留港澳就是22年，为祖国和平统一大业奔走呼号，直至1972年在澳门走完了最后的人生。

曹聚仁是最早在海外华文报刊上为新中国系统地作爱国主义宣传的海外记者。曹聚仁应林霭民社长之邀，前往香港出任《星岛日报》主笔。初到香港不久便在《星岛日报·南来篇》专栏首篇说：“我从光明中来！”他赞扬“中共治天下非常成功”，“解放军纪律严明，真正的秋毫无犯”。他向香港读者介绍了毛泽东、周恩来、陈毅等光辉业绩，介绍了大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所发生的巨大变化。这些文章在解放初期的港澳台地区引起了较大反响，台湾的国民党中宣部下令在港的宣传机构对曹聚仁进行总攻击，给他戴上“亲共帽子”。这场总攻击先后持续了5个多月，据他晚年回忆说有位小姐把批评他的文章剪存起来足有800多篇。他同样也不见谅于左派：进步的人士都回归大陆，而你曹聚仁自称“从光明中来”，为何又要来到南方呢？于是也对他进行指责批判，他处于左右挨骂的艰难处境中。

1956年至1959年，一般人都认为曹聚仁先后6次（据有关人士透露，实不止6次）被邀回大陆采访，毛主席曾两次接见他，周总理、陈毅副总理多次接见他。根据毛主席的意见，先让周总理、陈毅副总理及张治中将军等与曹聚仁会谈。



▲曹聚仁 50年代后期在北京

1956年7月16日，周恩来邀请他在颐和园夜宴。这次宴会经过，曹聚仁以《颐和园一夕谈——周恩来会见记》为题写成文章，发表在当年8月14日的《南洋商报》第三版上，接着印度尼西亚华侨主办的《生活周刊》也发表了更加详细的报道《周总理约曹聚仁在颐和园一夕谈》，正式向海外传递了国共可能第三次合作的信息。曹在报道中第一次提出“国共第三次合作”的口号，在海内外引起强烈震动，并且有深远的历史意义。10月3日下午毛泽东约曹聚仁作了长谈。毛泽东对曹聚仁在海外的言论很重视。当曹聚仁说自己是自由主义者时，毛泽东叫他不妨再自由些。毛泽东还向他询问了许多关于蒋经国在赣南的旧事。1958年8·23金门炮战前几天，毛主席再一次接见了，让他将中共金门炮战的目的主要是对美不对台的底细，转告蒋氏父子，后来他在《南洋商报》发表了金门炮战的独家重大新闻。每次回大陆采访，他都受到周恩来、陈毅等的接见，并作长谈，谋求祖国和平统一大业。曹聚仁晚年在港澳写作并为两岸和平统一奔走这一特殊使命，是由周总理和总理办公室直接领导的，工作性质绝对保密，在当时外间无从知晓内幕的。不过曹聚仁写给胞弟曹艺、原配夫人王春翠的220家信中，有不少书信中透露了他所负担的特殊使命，包括他的生活和治病也得到北京照顾。他从1956年到1959年，6次访问大陆写下了专稿230余篇计200余万字，出版了《北行小语》、《北行二语》、《北行三语》、《人事新语》、《万里行记》等书，他的报道成为当时“全世界华侨的思想指路牌”。

1959年，曹聚仁和林霭民再度合作创办《循环日报》、《循环午报》、《循环晚报》，并任日报主笔。数年后，这三报合并成为《正午报》，他仍任总主笔。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程思远写信告诉笔者“应曹先生之请为该报《政海秘辛》专栏写稿，所以彼此颇有交往”，说的就是这个时候。

叶落归根是中国人的传统观念，曹聚仁在晚

年，也渴望回大陆与亲人团聚，也想有个安定环境从事文史研究，“但他终于以能为祖国和平统一事业效力而感到自慰。他为此奔走呼号，竭尽心力，直至生命的最终”（夫人邓珂云语）。根据曹聚仁留下的大量史料看，曹聚仁确实已为祖国统一竭尽了全力。他在家书中说：“……本来我应该回国去了，但此事体大。北京和那边都不让我放手。前几年，我把局面拖住，可说是对得住国家了。”“这两年，我一直向北京请求回国去，但京中为了那件事，非叫我留在香港不可……”

所以曹聚仁在澳门逝世后，周总理如此重视安排料理他的后事，是很可理解的了。这样一位“为祖国统一大业，贡献了毕生精力”（罗青长语）的“爱国人士”（周恩来对曹聚仁的评语）曹聚仁，他的这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爱国精神，实在令人敬佩。

关于这一段经历，今年91岁高龄的曹聚仁先生胞弟曹艺在给笔者信中写道：“曹聚仁生而为中华民族发奋图富强、发展，甘心情愿在海外孤苦地作为一个‘灯台守’，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中国特出的真正书生。”“我认为曹聚仁以一个海外孤臣‘灯台守’的心情，奔走海峡两岸，呼吁祖国统一，是为了自己是中华民族之子孙，自甘情愿，为民族利益而尽一个书生之责的千古一人，并非台北的特使，也非北京的密使。”“曹聚仁在香港时，美国国务卿杜勒斯两度专访他，以十万、二十万美金诱胁他，要他去美讲学而被他婉拒。”

六 生命不息，笔耕不止

曹聚仁一生写下4000多万字的作品，这确实惊人。据他的儿子曹景行说：“爸爸一生发表了4千万字的文章，粗略划分一下，大约一半是大陆时写的，另一半则是到港后写的。每天3000字，每月近10万字，一直写到去世前几天实在提不起笔来为止。他留存于世的最后一张照片，就是躺在澳门镜湖医院的病床上，仰面朝天，左手举着垫板和稿纸，右手悬笔而书……这样的写稿生活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一种残酷，但不写就难以维持他和全家的生活。早年在上海，爸爸还能到大学兼课，来香港后再无这样的机会，完全靠一支笔，真的是‘手停口停’了。”如按他儿子的说法，他在香港22年与他以往的50年所写的文字相等，足见曹先生在香港的写作之快且勤了。

曹聚仁一生与笔墨为伍，写作不择时地，只要灵感上来，挥笔成文，一气呵成。他的侄女曹景滇回忆道：“伯父当年却能在最吵闹的环境里写作。伯父的《北行小语》、《北行二语》、《北行三语》等在海外

颇有影响的几本书，就是在我们的喧哗声中写成的。”曹聚仁生前友好、现任台湾国民党“总统府资政”马树礼也在写给笔者的信中说：“聚仁兄初到香港的几年，我们相聚最多，有一年我从印尼回香港住了一段时间，可说天天见面，他那时写作很多，我们一起在酒店饮咖啡时，他手中总是拿着稿纸，边谈边写……”

曹聚仁在香港写得最多的是通讯和随笔。曹聚仁不仅仅是记者，他同时还是一位作家和学者。曹聚仁在香港写过两部长篇小说《酒店》和《秦淮感旧录》，由于该两书至今仍未在大陆出版，学界很少提及。《酒店》由香港创垦出版社1954年出版，香港作家联合会会长、著名作家刘以鬯对《酒店》有过很高的评价；亦然先生也有专文评价《酒店》，认为“相对于50年代一些只作政治宣传的文学作品，此书可贵就在于它比较着重描画当时香港社会的现实”。《秦淮感旧录》则是写蒋家政权总崩溃前后以及美国在远东的军事阴谋等等的一部时事小说，从1947年写到1954年，写了100万字，分第一、二集，先后于1971年、1972年由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出版，这也是学界无法读到的书，因它至今也还未在大陆再版。

曹聚仁在香港写了不少传记作品，如《蒋百里评传》、《鲁迅评传》、《鲁迅年谱》、《我与我的世界》等，数量也十分惊人，总有数百万字之多吧！除了他的自传《我与我的世界》于1983年3月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鲁迅评传》即将由上海东方出版中心



曹聚仁晚年在香港寓所前